

古代白話短篇小說選

胡士莹選注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

图书馆

★藏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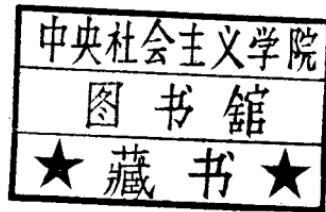
中國青年出版社

工242.7/9

58526

古代白話短篇小說選

胡士瑩選注



200189928

中国青年出版社

DM175/109

内 容 提 要

本书是从我国宋、元、明三代的白话小说里选出来的。这些小说大都是民间文艺。当时有一种专业讲小说的“说话”人，这些小说就是他们的“话本”。话本真实地反映了当时人民的生活，表现了人民爱憎分明的感情，它的内容丰富生动，成为当时人民最爱好的文艺形式之一。因此，这些作品富有人民性和现实主义精神。

本书从话本里选出历来传诵的十篇比较优秀的作品，加上较详细的注释，并对每篇的思想性和艺术性作了分析。在序言里，又对话本的源流演变作了系统的说明，分析了它们产生的时代，它们所反映的各种生活以及它们的艺术特征，可作为研究话本的参考。

封面设计：沈云瑞

古代白话短篇小说选

胡士莹 选注

*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

787×1092 1/32 9.75 印张 240 千字

1956年12月北京第1版 1982年11月北京第2版

1980年10月北京第7次印刷

印数 426,001—826,000 册 定价 0.77 元

目 次

序言	3
編例	27
礪玉觀音 (京本通俗小說卷十)	29
錯斬崔寧 (京本通俗小說卷十五)	47
滕大尹鬼斷家私 (古今小說卷十)	68
金玉奴棒打薄情郎 (古今小說卷二十七)	91
汪信之一死救全家 (古今小說卷三十九)	109
沈小霞相會出師表 (古今小說卷四十)	140
白娘子永鎮雷峰塔 (警世通言卷二十八)	179
杜十娘怒沉百寶箱 (警世通言卷三十二)	214
卖油郎獨占花魁 (醒世恒言卷三)	237
灌園叟晚逢仙女 (醒世恒言卷四)	283

此为试读,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序　　言

1

本書是选自我国宋、元、明三代的短篇小說。

我国用白話來創作和記述短篇小說，是在宋朝广泛流行的；作为一种文学样式來說，短篇小說在南宋便基本上完成了。而在這以前，我国的小說就有了源远流长的传统。

在秦朝以前的古代，人民便創造了許多神話、傳說和寓言。在《山海經》、《穆天子傳》和《列子》、《韓非子》、《孟子》等書中，我們可以看到像大禹治水、后羿射日、愚公移山以及守株待兔、揠苗助长等故事。它們反映了人民的生活和美德，表达了人类征服自然的願望，創造了一些简单而生动的形象。它們是浪漫想像的，但也富于現實性。

“小說”的名称，在秦以前就有了。东汉班固写的《漢書·藝文志》中还把“小說家”正式列为諸子中的一家。当然，从他所提到的十五种一千多篇的篇目来看，这些“小說”內容混杂，甚至包括“医巫厌祝”，可見汉以前的所謂“小說”，是指一些不成长篇大論的零碎“短書”，和后来的小說大不相同。但它們也是采自“街談巷語”的，其中也包括一些民間故事。

这些是小說最古的渊源。

汉魏六朝繼承了神話和傳說的傳統，在新的社會條件的影響下創造了大量的志怪小說和雜錄體小說。志怪小說大都神話色彩很濃，有的還是迷信的糟粕，但絕大部分已和人民生活滲透結合，其中不少篇幅反映了人民和壓迫者的鬥爭，反映了社會上的不合理現象，如于將莫邪、韓凭夫婦等，是有強烈的現實意義的。傳說漸漸和神話、歷史分家，發展成為歷史人物故事與雜錄，如荆軻刺秦皇和王嬌、司馬相如的故事，以及《世說新語》中搜集的對當代名流言行的許多速寫性質的短篇文字。它們更能如實地反映生活，記述真人真事。

這時期，很值得注意的，是關於職業的說故事的記載。這也是和宋朝口头文學的“小說”的形成有密切關係的。在宮廷中，漢朝以前就有說笑話的“侏儒”了。漢朝的東方朔，是傳述通俗故事的能手。但是最早記載藝人說故事、說笑話的，是三國時的一些歷史書。《三國志》注引《吳質別傳》有吳質召優人“說肥瘦”為樂的故事。曹植還為邯鄲淳“誦俳優小說數千言”，那顯然是多才多藝的曹子建從民間藝人那裡學來的。這就可見，當時說故事（小說）已經是“百戲”中的一種了。至於《魏書》和《南北史》中所記載的侍臣、賓客為他們的主子說世間事以供笑樂的事，就更多了（如《魏書》卷九十一《蔣少游傳》，《北史》卷四十三《李諧傳》附子《李若傳》，《南史》卷六十五《陳始興王傳》）。有的笑話和故事，說得成功，還被記錄下來流傳，像隋朝的侯白，不但能“劇談”，還寫了一本《启顏錄》。

這種說故事笑話的伎藝，到唐朝就叫“說話”。“話”，在古代就是“故事”的意思。值得注意的例子是元稹的《酬白學士詩》的自注：

嘗于新昌宅（白居易住宅）說《一枝花》話，自寅至巳，猶

未毕詞也。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例子是段成式在他的《酉阳杂俎》里写着：

因弟生日觀雜戲，有市人小說……

可以想見，当时城市日益扩大繁荣，市民人数激增，市民文艺也发达了，出現了市民的小說——“市人小說”，并且是杂戏中的一种。当时皇帝、官僚、市民都爱听“說話”。上面提到的元稹所說的《一枝花》話，大概就是市人小說之类。《一枝花》的故事經白居易的弟弟自行簡写成传奇小說，就是有名的《李娃传》。从这里也可看到唐朝市人小說和传奇小說的密切关系。

唐朝的市人小說沒有底本遺留下来，但受市民文艺影响的传奇小說遺留下来的却很多。和市人小說同为市民文艺的市民长篇叙事詩和說唱文学——变文——的底本也有遺留下来的。

从唐朝的传奇小說开始，文人們才有意識地創作小說（大概也是从唐代开始，市民艺人也有意識地創作小說）。他們不再單純地記錄故事或記述真人真事，开始通过情节刻划人物形象，广泛地运用艺术的想像虛构。他們接受了志怪和杂录的遗产，吸收了市民文艺的营养，在反映現實、塑造人物方面得到了空前的成就。他們所用的虽是文言，却也繪影繪声，生动多样。像歌頌和同情被压迫女性与恋爱的《霍小玉传》、《李娃传》、《鶯鶯传》等，像反映封建統治阶级的腐朽墮落，变幻无常的《东城老父传》、《枕中記》等，像向往任俠仗义，鋤强扶弱的《紅綫传》、《虬髯客传》等，不但反过来提高了市民文艺，还长期地給后世各种样式的散文、戏剧作品以良好影响。宋朝以来我国許多美丽的文学作品，都曾从传奇小說的丰富遗产中汲取題材的。

唐五代的市民叙事詩（如《董永行孝》、《季布罵陣》）和說唱文学（如《伍子胥》、《西征記》）也很发达，它們同样能用虛构想像

来刻划人物，结构情节，还同样开始以当代的现实题材为内容。特别是说唱文学，它的形式值得注意。它的有说有唱，韵文散文合组的形式，对宋朝的“小说”（话本）有不小的影响。而这些市民文艺的同情被压迫者、反对强暴的封建统治的鲜明倾向性，更是宋朝短篇小说现实主义精神的主要传统因素。

由此可见：

第一、从古代、汉魏六朝、隋唐五代直到宋、元、明，我国小说的主流始终反映着现实生活，并由浅入深地发展着现实主义的传统。

第二、丰富的人民生活和民间文艺，经过两种主要方式形成小说（和其他文艺作品）：一种是职业艺人的体验搜集和口头加工创造，并简要地记录下来；另一种是文人的体验搜集和进行文字的加工创造。这两者并无严格的界限，并且不断相互影响，结合，在形式上也相互借鉴补充。

宋朝的“小说”就是在这样的历史传统上发展形成的。

2

北宋王朝统一了中国，结束了五代十国的长期混战，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大帝国。为了巩固统治，它曾减轻赋税，奖励农垦。这些，都促使农业、手工业恢复与发展，人口激增，商业繁荣。从而，封建统治阶级对人民的剥削也日渐加剧。

城市，就在剥削阶级对农民和手工业者残酷剥削和统治的基础上，作为生产力发展的后果，为广大农民和手工业者贫困破产的后果，而日益扩大起来，繁华起来。北宋的京城汴梁（开封），户数达二十六万。南宋的城市更加扩大，京城临安（杭州）在度宗时户数达三十九万，“人烟稠密，城内外不下数十万户，百

十万口”(《梦粱录》)。在城市中，集中着統治阶级分子——官僚、大地主、大商人；也集中着巨大的市民阶层——各行各业的手工业者(手工业工人、手工业者、作坊主、工場主)、店員、商人、小販、倡优、游民、統治阶级的奴仆走卒，以及破产流入城市的农民。南宋的城市里更增加了从广大中原淪陷区流亡南来的統治阶级分子和市民、农民。

市民阶层要求有自己的文娱生活，唐朝以来就相当兴盛的市民文艺便在两宋的城市中更加繁荣地发展。

宋朝市民的公共娱乐(和消費)場所叫瓦子(也叫瓦肆、瓦舍、瓦市)。瓦子中百戏杂陈，戏場林立，而且兼备“貨薦、卖卦、喝故衣、探搏、飲食、剃剪……”能叫市民們“終日居此，不覺抵暮”。市民文艺的各种样式在瓦子中找到了比較固定的演唱場所，适应着市民的要求，爭奇斗胜，互补短长。而“說話”，便是瓦子中最受人欢迎的伎艺之一¹。

宋朝不但有說話人，还有专门替說話人記錄或編寫說話底本(話本)的文人(說話人中也有一些是知識分子)。这些文人有自己的行会組織——書会，所以这些文人叫“書会先生”或“才人”，他們大部分是科举失意但有一定才学和社会知識的文士。說話人也有自己磨礪唇舌訓練技术的組織——雄辯社。社中的成員(艺人)則称为“老郎”。說話分工很細，說話人不但职业化而且专业化(各专一家一类)，以滿足市民多种多样的爱好。据《东京梦华录》、《都城紀勝》、《梦粱录》、《武林旧事》、《醉翁談录》等書的記載，当时說話有四家数和許多細目，大抵可分：

(1)小說(又名銀字儿)——包括烟粉、灵怪、传奇、說公案、說鉄騎儿，还有朴刀、杆棒、妖术、神仙；

(2)說經——附說參請、說譚經、彈唱因緣；

(3) 講史——講說《通鑑》漢唐歷代書史文傳興廢爭戰之事。專門有說三分，說五代史；

(4) 合生、商謎、說譚話——三者都有要笑諷刺性質。

由此可見，宋代“說話”的範圍，還和漢唐五代相似，包括着故事、笑話、謎語等，並且由於唐代以來佛教講唱經文的流行，還把說經也包羅在內。在這四家數之中，營業發達的是“小說”和講史，而講史却又“最畏小說人”。“小說”的聽眾多，藝人多，僅杭州一地，有名的伎藝人九十二人中，小說人就居半數以上。

“小說”為什麼這樣發達呢？主要的原因當然是它的人民性和現實主義精神。它以短小精悍的形式（一二次講唱完畢），反映當時的市民生活，即使是以前代的或其他階級、階層的生活為題材的，也無不與當代市民的生活和喜怒愛憎息息相通（詳見第三節），這是長篇的歷史故事講史和宗教故事說經所不能比擬的。其次，也因為它有相當強的藝術性，在人物塑造、故事結構、細節描寫、語言運用上都有很大成就（詳見第四節），遠超過當時的講史。再次，它在藝術樣式上繼承和發揚了民族傳統，也是它受歡迎的重要原因。

北宋時，“小說”繼承了唐五代市民講唱文學韵散合組的形式。它有說有唱，有銀字笙、銀字觱篥伴奏（故“小說”又名銀字兒）。在宋初許多善于“唱導”、“轉變”（“轉”就是“疊”，轉變就是講唱變文）的和尚加入瓦子賣藝化緣的時候，小說人也只有這樣才能壓倒和尚²。另外，“小說”還有一些在伎藝競爭中，和變文、詞、諸宮調等互相交流、借鑒而形成的特点。像“入話”，又名“得勝頭迴”、“笑要頭迴”等，是所有的“小說”話本都有的。在正文前附加一個小故事，或和正文意思相似，作為引導；或意思相反，作為對比。小說人為了賣藝謀生，不論在街頭或在瓦市開場，都

得拖延一些时间等候听众，又要稳定住已到的听众，就需要这“入话”。“小说”还有开场的诗词，这和入话一起，起着聚集听众、肃静和启发听众的作用，并有“借此形彼，无中生有妙处”，以增加兴趣。“小说”的收场也有诗，这是为了交代结尾，重新点明主题思想；并唱起来余音袅袅，增添回味。这些都曾帮助小说人热闹场面，丰富内容，加强表现。（明朝的拟话本，在传统力量的影响下，把这些作为文学形式的特色保留着，也相当地增加了读者的兴趣。）

后来，“小说”的密切结合市民生活的优越性表现出来了，小说人和书会先生的技巧提高了，同时，伎艺的分工更细密了，不但在内容方面分了烟粉、灵怪等好多种，在形式方面也渐渐地形成一种基本上脱离诗歌，以散文讲诵为主的“小说”。这种形式是在主、客观条件的影响下形成的。一方面，小说人大受欢迎、供不应求，以讲诵为主就可能不用“歌伴”、乐器，所需艺人更少，即使歌喉不好，也能表演，便扩大了小说人的队伍和活动范围；另一方面，“小说”逐渐进步到从矛盾发展中表现人物性格，叙述不断推进的比较复杂的故事，这就要求“小说”更多地使用自由而复杂的语言，而经常交番地使用韵文歌唱，有时反而限制了语言运用，中断故事发展，并且不易听懂。所以南宋的“小说”话本，如《京本通俗小说》和《清平山堂话本》中的一部分，就大都以散文为主，只有在故事告一段落或需要静止地描写人事时才插韵文，就是把这些韵文抽去，散文部分还是完整的。

这些“小说”话本，是口头文学的底本，是许多无名作家——小说人和书会先生的集体智慧的结晶。话本虽不及有名小说人口头讲诵时那样丰富生动，却已创造了若干有血有肉有个性的人物，有了根据人物性格虚构发展的故事情节，有了一些环境和

細節的描写，已經是可供閱讀的小說了；因而“小說”話本也就逐漸傳抄刊布，加以當時民間的印書業開始發展，話本有了刊印的條件，我們今天還可以看到的宋元“小說”話本，就有五六十種之多。

這一切，都足以說明，我國的用白話來創作的短篇小說，到南宋便正式形成了。

南宋以後，講史逐漸形成長篇章回小說，而“小說”的一支，也向長篇章回小說發展。《碾玉觀音》分上下兩段，《西山一窟鬼》在敷演時“變做十數回蹊蹕作怪的小說”，《陳巡檢梅嶺失妻記》分回更明顯。元代產生的多回長篇小說《水滸》，既是講史《宣和遺事》的發展，也接受了“小說”的影響，是融和了許多同类的“小說”再創作而成的。“小說”的現實主義精神在《水滸》中達到高峰。

元朝，雜劇、南戲和長篇小說並興，“小說”（短篇小說）相對地衰落，但繼承着南宋“小說”高潮的余波，到了明朝嘉靖年間，刊印話本之風大盛。這是由於工商業更加發達，城市更加發展，市民的文化水平也有提高，產生了閱讀小說的需要；而印刷技術的發達，也為刊印準備了條件。清平山堂主人洪楩，曾大量刊印宋元話本，名叫《六十家小說》，分雨窗、長灯、隨航、欹枕、解閑、醒夢六集，每集十卷。現僅殘存雨窗、欹枕兩集共十二種。又現存的《清平山堂話本》十五種，也應該是《六十家小說》範圍內的。再加上阿英同志所發現的兩種殘本，共得話本二十九種。這是現在所能見到的我國白話短篇小說最早的刊本，很可珍視。明萬曆以後，又從刊印話本發展到大量創作擬話本（摹擬話本形式的短篇小說），個人創作的，不以講誦為目的，而以傳閱為目的的白話短篇小說流行了。著名的作家兼編刊家是馮夢龍與凌濛

初。

馮夢龍，字犹龙，一字子犹，自号墨憨斋主人，长洲人。崇禎間做过寿宁县知县，死时年七十余。他是民間文学的功臣，也是短篇小說的功臣。从他的作品和言論来看，他很受当时东南地区进步市民思想的影响，他也相当尊重人民的感情和智慧。他把一生精力用于民間文学的搜集、編輯、改写和出版。他曾刊行过《童痴一弄》（《挂枝儿》）、《二弄》（《山歌》）等民間歌曲，曾作《双雄記》、《万事足》諸传奇。尤其在小說方面成就最大。他曾改編《平妖传》和《新列国志》，整理創作了著名的“三言”——《喻世明言》（即《古今小說》）、《警世通言》、《醒世恆言》，各收話本四十篇，共百二十篇。內中多數是根据宋元旧本修訂的；也有他自己的創作。

凌濛初，字玄房，一字初成，号卽空觀主人，烏程人。崇禎中做过上海丞，后升徐州判。他用文人之笔来大量拟作話本。他写了《拍案惊奇》初、二集（也有少數是民間旧本），有短篇小說近八十篇（中有一篇重复，一篇杂剧），称为“二拍”。就思想和文字說，他都不及馮氏，就篇幅說，他是一位創作短篇小說最多的作家。他的小說中，也有反映市民生活及意識的积极方面的佳作，可惜很多是封建說教和色情描写，損害了文学的价值。

“三言”、“二拍”在明末风行一时。后来有一位“抱瓮老人”在这五个集子中选出佳作四十篇刊行，名叫《今古奇觀》。在清朝統治者排斥和禁止小說的情况下，《今古奇觀》还能幸运地流传；“三言”、“二拍”就湮沒了三百年，直到今天，国家出版机关才把它們整理出版。

高度中央集权的明王朝，开始时曾积极扶植农业生产，兴修水利，并把百工从元朝統治者的奴役下解脱出来，曾大大地刺激

了工商业的发展，也促进了海外貿易。但封建王朝根本上是限制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的，明王朝对国内重要工商业如冶金、采矿、紡織、陶磁、盐、茶等采取严格的垄断政策及苛重的稅收制度，对海外华侨的資本采取排斥的政策。我国的資本主义經濟的萌芽和資本主义思想的萌芽在与封建主义艰苦斗争中迟緩曲折地发育着。这在明末的拟話本中是有一些反映的。但当时，市民阶层中毕竟还没有能产生資产阶级，市民意識也未能成长为資产阶级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市民和封建統治者的斗争只是自发的、分散的、軟弱的、經濟性的。这些，也就最終地影响到短篇小說，使它不可能得到更进步的世界觀的滋养。同时，拟話本又不能像宋朝的“小說”那样直接和市民群众結合，反而日益商品化，書商为图利而刊印，文人有的也为图利而編撰，这样，拟話本越来越多地反映市民的庸俗面，越来越多地滲进封建文人的反动思想和各种低級趣味。这便使明末的許多种拟話本小說集如《石点头》、《西湖二集》、《幻影》、《醉醒石》等只有少数較好的作品，絕大多数更在凌氏之下。落后的清朝統治了中国，繼承了明王朝的垄断、榨取的办法，残酷剥削工商业者，并垄断、压制国外貿易。这些都对我国民族資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起了阻滞作用。尤其在思想方面，残酷的文字獄虐杀与压抑了无数有进步思想与民族意識的优秀人物，反动的文化政策与怀柔政策，遏止了思想自由。对小說、戏剧，则用政治力量鼓励和传播最落后的封建的迷信的作品，对流行的反映現實的小說，则“严查禁絕”，連短篇小說賴以苟延残喘的淫亂奇怪的故事，也因为有蔑視封建礼教的成分而遭禁。当时社会矛盾虽然尖銳，但封建势力却占压倒的优势。市民中还不可能产生自己的作家，出身封建統治阶级的人，在这种高压之下敢于批判封建社会的像吳敬梓、曹

雪芹等又极少，这样，清乾隆以后的拟话本便纯粹是宣传封建伦理的枯燥故事，内容反动陈腐，艺术上完全背弃了小说的现实主义传统。因而，典型的“忠孝节义”的小说集《娱目醒心篇》问世，拟话本小说便由衰落到了终结。

3

宋、元、明短篇小说是市民的小说，它们从市民的立场、观点来反映生活中的各种矛盾。市民阶层的主体是商品生产者和运销者——手工业者和商贩。他们在经济上要求自由发展，在政治上要求一定的人权和地位；这都和封建统治阶级的专制、垄断发生矛盾。当明朝城市经济更加发达，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工场手工业和国内外贸易的力量茁长，市民和封建统治阶级的矛盾就更尖锐化，表面化。市民群众中有很大部分是陆续来自农村的破产农民，他们更带来农民阶级的民主要求的阶级反抗的精神；市民中广大的手工业工人受残酷的压迫和剥削或双重剥削，和统治阶级的矛盾特别尖锐。市民还不是独立的阶级，但他们反抗的是封建制度，他们是进步的社会力量。

和市民的经济、政治状况相适应的市民意识成长了。它包含着要求个人自由的“民主”成分，它反对理学和礼教。在晚明激烈的市民反封建斗争和“党争”中，在明末清初的农民大起义和反清斗争中，市民思想——前期资本主义思想曾一度蓬勃发展。它反对残酷的封建剥削和压迫，主张平等，要求均田减赋，扶植、保护工商业，它代表了全国各被压迫阶级和阶层的利益。

因而，市民的作家和接受市民影响的作家就有可能相当忠实地反映现实，通过以市民为主角的人物形象，概括市民阶层比较进步的生活、意识和斗争，暴露封建社会的黑暗腐朽，或借用

历史人事来反映现实，发抒市民的见解。这样，他们的作品就成为反封建的文学。这也就是宋、元、明短篇小说的优秀部分的人民性和现实主义精神的基础，也是它的积极浪漫主义因素的基础。

市民意識和封建意識的冲突，是短篇小说中的基本冲突³。

当时的各种主要社会矛盾，在短篇小说得到多方面的艺术的反映。

首先，在阶级关系方面：

宋朝的佃租、赋税、徭役、庄园制使土地兼并日趋剧烈；元朝统治者大量霸占土地，广大农民沦为农奴或奴隶；明朝土地高度集中，赋税与地租剥削因农产品的商品化而更加苛重。农民大批破产流亡，被迫起义。

在城市中，宋朝的专卖专营和苛捐杂税，元朝的强占百工为奴，明朝的垄断政策和矿、税监制度等，都加深了市民阶层和封建统治者的矛盾。统治阶级把城市当作“销金锅儿”（指杭州），无限地挥霍民脂民膏⁴。宋朝这样，元明更甚；而下层的市民却很多是“浮食寄民，朝不保夕；得业则生，失业则死”。明朝工场手工业大增，有了大批雇佣手工业工人为主的市民阶层，曾掀起如火如荼的有组织有纪律的斗争，甚至打死税官，烧毁监署。

对人民和封建统治阶级的矛盾斗争，短篇小说是有一定的反映的。我们可以在宋话本的目录中看到不少后来集中在《水浒》中的英雄的名字如花和尚、武行者、石秀孙立等等，而《水浒》是总其大成。

我们可以见到的反映阶级矛盾的作品，也有不少：如《灌园叟晚逢仙女》痛责了恶霸侵占土地的罪行；《拗相公》通过王安石的遭遇，表达了人民对北宋统治者的强烈愤怒（王安石在这里只